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方法论对构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刘明远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它既包括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阶层经济生活条件的基本原理,还包括专门研究国家层面、国际经济关系层面、世界市场层面的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外在表现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需要抽象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基本原理支持,还需要具体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解读与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方面的服务;要想有效地满足这样的要求,运用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方法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是基本途径。

**关键词:**“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辩证逻辑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

## 一、问题的提出

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是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可以被看作苏联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多年来,中国学者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被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们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建构的理论体系,而且其叙述方式都是对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政策、策略、方略的解读与论证。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国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新发展,但既缺乏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又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构筑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从而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解读与论证既缺少一个完整的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又缺乏基本原理的支撑。由于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以描述经济现象为主的西方经济学乘虚而入,攻城略

地,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本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体制制度的不断创新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勤劳智慧干出来的,但一些西方学者却不顾事实,试图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解释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的结果,并试图引导中国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张推进改革、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西方。所以,中国要想主导和控制“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就必须把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发展模式,总结概括为能够为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提供科学的解读和论证的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其能够有效地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方法;分析经济关

收稿日期:2018-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JL003)。

作者简介:刘明远,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系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把社会经济制度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加工成经济范畴,然后再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体系,进行理论叙述,全面揭示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经济规律,从而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形成原理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一旦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形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任务,学习和借鉴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六册结构”计划的理论体系构筑方法就成了必然“选项”。因为,构建理论体系需要确定研究对象和叙述方法;明确研究对象,才能确定考察范围及其所含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要具有科学的体系,又需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马克思当年之所以能够做到从本质到现象全面解剖“资产阶级经济制度”错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就不可能提出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六册结构”计划,就不可能创立为马克思引以为豪的被称作“德意志民族辉煌成就”的《资本论》基本原理体系及其逻辑结构。

本文以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的体系构筑方法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结构、方法论依据进行探讨,以此为正在发展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种可以借鉴的思路。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经济学体系是“六册结构”计划,但实际完成的仅有《资本论》(相当于“资本一般”)。就逻辑结构而言,“六册结构”与《资本论》只是“大圆圈套小圆圈”的包含关系。所以,本文引述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主要以《资本论》的方法论为例证。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以问题为导向,立足现实,既能够有效地预见和解决中

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又能够使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政策、策略、方略经过抽象概括上升为基本原理,成为进一步解决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指导与理论工具。然而,中国学术界研究和编写了几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了无数教科书,但基本上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层次,尽管他们曾一度模仿过《资本论》的结构,但其内容基本上是对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解释与论证。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学者起初以模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后来,因为中国对“苏联模式”产生质疑,再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许多中国学者以《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尝试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3卷)属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体系属于典型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结构。再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经济学界推出了那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与“北方本”,其结构、叙述方式依然是典型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结构,但开始涉及“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与宏观调节”等内容,对现行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分析与描述依然是这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共同特征。在随后的发展中,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基本国策逐渐形成与深入发展,尤其是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方式逐渐开始转型,国家一系列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方面的政策陆续出台;“南方本”和“北方本”的内容与结构也“与时俱进”,及时吸收了国家制定出台的大政方针、政策、方略等,逻辑体系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然后依次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体、市场体系、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的平衡与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内容,理论体系的叙述方式基本上没有突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

关于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的结构与内容的详细论述,见拙作《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的总体结构与内容探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在此列示“六册结构”计划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关系总体。

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建设进入全面实施与逐步完善阶段,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建设的实践为依据,参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教委组织专家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国家教委本”),这套教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背景,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这样的线索安排结构体系,其思路对此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挥了示范作用。例如,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社会主义部分)》在继承了“国家教委本”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近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主张。张宇、逢锦聚、洪银兴等学者已经率先推出了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新版本。与老版本相比较,新版本虽然一如既往地增加了对现行经济政策、策略解读与论证的新内容,但体系、结构基本上没有新的突破,其理论要素与逻辑顺序依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微观经济运行 中观经济运行 宏观经济运行 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 对外经济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学者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历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界虽然做到了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解读与论证现行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水平,改进理论的阐述方法、视角,但始终未能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既不同于只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亦不同于那些只着眼于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描述与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1)理论要素的选择、体系的构筑完全从本国实际与实践经验出发,而且主要围绕党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策略、方略等现

实经济政策进行解读与论述。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筑的历史,就是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寻求答案的历史。(2)构筑理论体系时虽然在形式上继承了《资本论》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这样的基本结构,也号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但事实上既没有做到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安排结构,也没有做到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理论叙述;既没有一个辩证的逻辑起点、按经济范畴排序的逻辑结构,也没有反映范畴的生成过程,以及范畴本身的发展、经济规律生成的逻辑依据,只是运用形式逻辑方法把现实经济政策及其术语按照时间、范围、发挥作用的顺序予以排序而已。(3)实践在先,理论体系的构筑在后,现实经济政策指导理论体系的构筑,而不是相反。每当现实经济政策能够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而适时做出调整、创新,就越是能够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社会和谐稳定。(4)由于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特定时期现实经济政策的解读与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以问题为导向,反映这些政策的理论体系也是以问题为导向。所以,这一学科的内容紧贴现实经济政策,当现实经济政策十分有效、十分成功的时候,反映这些政策的理论体系也就被认为是很“管用”的科学体系,对现实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一旦现实政策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反映这些政策的理论也就很快被边缘化,被遗弃。所以,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时效性、实用性、问题导向性。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适时推出和调整经济政策,适时转变发展战略,从而创造了中国的发展奇迹。由于经济政策富有效率、发展战略精准,反映这些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充满活力。但是,这样的直接服务于国家现行经济政策、基本方略、基本国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难以提供其服务对象的基本原理,其基本原因是理论界没有运用抽象法把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归纳、综合为范畴,也没有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揭示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即经济规律,从而未能形成一个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原理的政治



经济学体系。

其实,在上述具体原因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即没有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叙述方法是问题的关键。

### 三、来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辩证逻辑方法论的启示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马克思首创辩证逻辑方法,又将其首先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的实践证明,辩证逻辑方法是解剖社会经济制度、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唯一科学的方法。所谓辩证逻辑方法,简单地讲,就是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形式逻辑,其基本范畴和方法包括:(1)研究方法:具体—抽象—具体。(2)叙述方法:抽象—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3)基本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4)经济范畴的演绎过程:一般—特殊—个别。(5)形式逻辑方法运用:研究过程以“归纳”与“综合”为主;叙述过程则主要以“分析”与“演绎”为主。无论研究过程还是叙述过程,都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6)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是一个方法论体系,是一个整体方法。多年来,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几乎都说他们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其中最为熟知的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等等。其实,如果只是运用了其中的某些方法,如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法等,还不能称其为辩证逻辑方法。

当然,在辩证逻辑方法中,起主导作用的方法是抽象法。所谓抽象,就是从同类现象中抽出共同的、本质之点来,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无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研究过程),还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研究与叙述过程),都离不开抽象。抽象法在科学研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sup>[1](P8)</sup>通过抽象法的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始部分就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马克思的实

践表明,要对社会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必须运用抽象法。西斯蒙第之所以最终未能建立起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在于他反对运用抽象法。李嘉图之所以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也在于他不懂抽象法。事实上,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的必然性,都必须通过科学抽象法才能揭示出来。

研究方法,叙述方法是辩证逻辑的基本内容。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马克思当年之所以能够做到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全面解剖“资产阶级经济制度”错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本质、结构、范畴与规律体系,提出“六册结构”计划,创立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基本原理的叙述与对具体问题的叙述在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其基本方法始终是辩证逻辑方法。为了回答“物质利益关系的难题”,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制度纷繁复杂的感性具体出发,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方法,“分析经济关系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把社会经济制度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加工成经济范畴,然后再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体系,进行理论叙述,全面揭示经济范畴、经济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从而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形成既包括基本原理又包括对具体问题、经济现象进行阐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进行系统研究与阐述的目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创立,马克思就无法做到从本质上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如果没有辩证逻辑方法的创立,就不可能构建像《资本论》、“六册结构”计划这样科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有关辩证逻辑方面的专门著作,但“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运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逻辑方法。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所以要创立和运用辩证逻辑方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决定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和,其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

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最终通过收入表现出来,而各种收入都表现为价值,且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活劳动,获得这些价值的权力与份额决定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这样的一种经济条件下,要想完成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就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抽象、最一般、最基本的范畴开始,运用辩证逻辑方法,从抽象到具体阐述范畴的辩证发展、揭示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趋势,这样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思维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使范畴发展为总体范畴。

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优越性远超形式逻辑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关系、进行理论体系叙述能够达到运用形式逻辑方法无法达到的目标。马克思运用辩证逻辑方法为其“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制定了“六册结构”体系,这个体系从最一般的抽象范畴“商品”开始,上升到“资本一般”“资本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然后考察与资本相适应的“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在结束了对“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考察之后,再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承担者“国家”,继而又上升到“国家对外”,考察生产的国际关系,最后上升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范畴“世界市场”。整个体系包括原生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2](P47)。“资本”为什么是整个体系的起点,“世界市场”为什么是整个体系的终点。整个体系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安排结构、叙述内容、推演理论。“六册结构”体系的前三册属于基本原理,依次研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基本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后三册是在基本原理基础上在更大范围、更加具体层面上做一些基本叙述,属于较为具体的理论叙述。前三册是后三册的理论基础,后三册既是前三册理论的辩证发展,又是其具体化形式。“六册结构”体系实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的考察。

运用辩证逻辑方法能够真正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深入、全面研究的目的。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过程从感性具体开始,运用抽象法,从具体到抽象逐层解剖经济关系并将其加工成范

畴,当这个过程到达最抽象、最一般、最本质的关系的层面,得到最简单、最抽象、最一般的范畴之后,随着理论叙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研究过程还必须从抽象回到具体,把前一过程尚未发现的关系揭示出来并将其加工成范畴,为理论体系的构建创造出完整的理论要素。在这样一个“具体—抽象—具体”完整的过程中,“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3](P111)。辩证逻辑要求,为了解释本质规定,固然要先接触现象,通过分析、抽象,来揭示出本质规定。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它还要从本质回到现象,要在本质的进一步发展中来说明现象,用现象是否符合本质,来对前面所做的分析、抽象进行验证。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当认识通过作为典型的个体所进行的分析,达到了普遍的规定之后,这个运动并没有完成;为了完成这个运动,还得从普遍到特殊、个别的另一个方向的运动,使开始时被舍弃掉的、个别的的东西,重新和一般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人才能在思维中达到掌握具体的目的。马克思的研究过程是这个过程的典范。

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运用辩证逻辑再现生产关系总体符合经济关系的发展规律。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理论体系、叙述经济范畴与经济规律体系演变,这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导过程,有许多在直接感知甚至在形式逻辑推导层面不能发现的关系及其范畴、规律,在辩证逻辑分析、推演、综合过程中能够被发现。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找到了整个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满足资本连续不断运动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理论前提与实现条件、价值转型的中介环节、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与原因等一系列重要范畴、规律,这样的结果是运用形式逻辑方法无法做到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样是社会经济制度,而且要同样研究生产关系总体,从本质到现象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体系、《资本论》方法为指导,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仍然

是无法回避的基本选项。

#### 四、来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启示

从总体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其本质、结构、范畴与规律体系,确定逻辑推演的起点范畴十分重要,因为它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是马克思构筑理论体系、进行理论叙述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之一。马克思经过多年探索,最终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推导出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元素、细胞形式是“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sup>[1]</sup>(P47)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最单纯的形式,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都是从商品发展起来的。起点范畴必须作为细胞、元素的形式包含在体系的一切范畴之中,而在体系中的所有范畴就它的起源来说,又都可以而且必须追溯到起点范畴。他指出,任何有机体作为一个总体都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在历史上就是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sup>[2]</sup>(P236)。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商品作为资本的逻辑起点,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其中包括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一直到地租等要素都属于自己,把它们变成货币商品、资本商品、剩余价值商品,等等;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理论要素,例如信用制度等范畴,从这个商品社会中创造出来。起点范畴是作为细胞、元素的形式包含在体系的一切范畴之中,而在体系中的所有范畴就它的起源来说,又都可以而且必须追溯到起点范畴。如同生物学把细胞看成是比较复杂的有机体的共同的起源,表明它们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它们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是统一的。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把商品作为逻辑起点,这在形式上是逻辑的,也就是抽象的东西,在内容上是现实原型在逻辑上的再现。逻辑起点问题,是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关键问题,逻辑起点的确定关系到理论体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

不仅关系到这门学科逻辑发展的上限与下限,而且还关系到它的基本内容、结构体系,以及它们的各个方面、侧面的联系、展开,范畴的排列顺序等问题。《资本论》的终点范畴是“地租”,只有揭示了地租范畴,才能最后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的社会,证明全部生产都是由价值来调节的,表明《资本论》中的各个经济范畴都是价值规定的发展和具体化,表明商品及其价值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研究对象系统的质,只有抓住这个质,才能提纲挈领地把握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地租的确是《资本论》逻辑的终点范畴。所以,起点是潜在的体系,体系是展开、完成的起点,通过起点的展开推出体系,通过体系的构建来说明和论证起点。因此,我们在探讨《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决不能只局限于起点,必须与其展开以及对整个体系的全面、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结合起来。只有循着这样的辩证方法来探讨起点,才能达到从整体上把握起点的目的,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正是它才能成为整个体系的起点。《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确定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与终点的光辉范例。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这几年编写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具有十分相似的逻辑结构、理论体系与具体内容。整个理论体系叙述的起点范畴均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分析与阐述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具体内容,对每项具体制度的考察又基本上包括作为范畴的内涵、作为制度被采用的原因,以及该项制度的结构与具体实现形式,这项制度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作用、意义等。应当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属于典型的形式逻辑叙述方法,因为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先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然后才能研究和分析这个制度,才能认识这个制度的基本特征、经济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但是,这样的起点范畴决定了随后展开的内容只能是现行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描述,尽管这样的描述也或多或少运用了矛盾分析法,但难以做到使范畴的发展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演绎更加具体的、具有内在联系



的范畴与规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所以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决定了其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应当是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最一般、最普遍的范畴,它还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细胞形式,并且包含着这个制度一切矛盾的萌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关系总体,不能把这个“总体”直接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这就如同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资本论》的起点范畴一样,它本身是被解剖的对象,其内容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范畴和规律体系组成,对它的科学认识必须运用抽象法,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对它的认识成果的理论叙述必须从抽象到具体、运用辩证逻辑方法,也就是必须从最一般、最普遍的范畴开始逐步上升到最具体的范畴(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而且必须按照经济范畴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这样的辩证发展过程演绎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

中国至少在未来30多年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依然是资本,只不过这里的资本既包括“公有资本”也包括“私有资本”而已,理论基础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理论叙述必然从价值的载体“商品”开始。否则,坚持劳动价值论、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范畴与经济规律体系就失去了唯物主义基础,就无法运用辩证的逻辑体系演绎理论体系。在此,很有必要提到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汤在新教授,他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详细地阐述了“六册结构”计划对构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借鉴意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然不是产品经济而是商品经济,那么,它就同样应从商品着手展开分析。因为,在这里,商品是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是规定性甚少的抽象范畴。如果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具有众多规定性的具体范畴开始,要么只能获得“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要么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或法

学的幻想”。[4]

## 五、来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推演的启示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及其证明总是同这门学科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为了对这个体系进行证明,必须借助于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中介环节的作用,才能形成一个范畴的网络系统。只有沿着这条通过中介环节构成自己的路径,政治经济学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这种科学就表现为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内在转化。从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元素形式出发,遵循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理论体系,最后回到“思维的具体”,完成整个理论体系的叙述。整个过程表现为一方面经济范畴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多层次递进演绎,另一方面是经济规律在范畴的辩证发展中被揭示出来。在这样的辩证演绎过程中,一般、特殊和个别范畴是根据它们在整个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被演绎、推导出来。在《资本论》逻辑体系中,主线上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而是发展中的种属关系。后一个范畴是从前一个范畴转化、引申出来的,是一般向特殊、个别的发展,虽然后一个范畴的外延比前一个范畴要小,但它却包含着前一个范畴处在萌芽状态时的内容的新发展。后一个范畴再向后一个范畴的演绎,又是新的一般向特殊、个别的演绎。这样就形成一个从一般向特殊、个别发展的梯次演进结构。大层次中套着小层次。《资本论》第1~3卷,分别形成一个高层次,整个演绎过程表现为螺旋形的前进运动,“六册结构”体系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演绎进程中,同时还伴随着新的个别、特殊向一般发展的归纳运动。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辩证逻辑的演绎与归纳过程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把前一个认识阶段揭示出来的简单的、片面的、贫乏的规定性,通过综合复制、再现出认识对象的整体。在这里,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是相对的、发展变化的。对前一阶段抽象的规定来说是具体的,但是对更加具体的规定来说又是抽象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整个过程中,抽象与具体既是自己又是对方,相对

于前一范畴而言是具体的,但对后一范畴而言则是抽象的。对每个具体且特定的关系来说,抽象和具体的地位是严格限定的,抽象不能是具体,具体也不能是抽象,否则,其相对性就会变成相对主义,变成一种诡辩。明确了这点之后,就可以理解到,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较抽象的范畴不必借助于随它之后出现的较具体的范畴。例如:为了说明商品范畴无须借助于货币、资本等范畴,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的基本前提是商品生产普遍化,所以商品就成了它的基本的、本原的要素。对于货币、资本等形式来说,商品是它们最抽象的、最简单的存在形式。反之,为了说明货币、资本的起源、本质,就得借助于商品及其价值形式。

已经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既不存在抽象范畴与具体范畴的差别,也不存在范畴的辩证演绎,只是按照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等的层次高低、范围大小、出场顺序排列,甚至也不存在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问题。所以,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说,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存在辩证的逻辑推演,这也足以说明它不具有基本原理的属性。

## 六、马克思经济学对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与核心范畴的启示

运用辩证逻辑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构筑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体是既定的。例如:如果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个主体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个主体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研究社会经济关系从这个“既定的主体”出发,就是从某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实际出发。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

义。”<sup>[2]</sup>(P44)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的逻辑主体,它的分篇决定于这个主体本身内在的发展史的客观逻辑,而不是决定于一般的社会发展史的客观逻辑。分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范畴的地位和顺序的决定。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主体出发,是理解“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整个逻辑结构体系的关键,也是理解其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关键。马克思说:“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已经形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sup>[2]</sup>(P206),所以关于这个主体的经济学,也就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逻辑中再现的历史,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历史。至于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历史则不是属于资本的逻辑本身所要研究的直接对象和范围。

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概括和表现。在《资本论》逻辑中的经济范畴,只是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方式或存在规定的个别侧面的表现。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体系,必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范畴,它支配和制约着其他范畴的发展及其顺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是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最基本的范畴,在安排经济范畴时,资本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具体说来,就是要按照当时资本发展已经成熟、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的社会内部结构的发展顺序,来安排各个经济范畴的顺序,而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按经济范畴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先后顺序来安排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因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六册结构”就是以资本这个范畴为中心点建立起来的,只有抓住这个中心点,才能把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从其固有的内部联系来说明,并在范畴的安排上明确主从关系。由于“六册结构”贯彻了上述分篇原则,才实现了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深刻地再现其各种经济关系,使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所以,就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而言,其起点范畴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而阐述资本的起点范畴是商品。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比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利益主体与更加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不仅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也存在多种分配



方式。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核心范畴是资本(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统一),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

## 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项特别说明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应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都应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和运行的经济规律,这些规律既包括反映本质关系的经济规律,还包括反映感性具体层面的现象形态经济规律,应当是多个层面、多重规律的统一。而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研究过程必须从感性具体开始,逐步深入到最本质、最抽象、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层面;然后,理论叙述必须从最简单的范畴开始,运用辩证逻辑方法从抽象到具体逐层展开,直至回到具体,实现全面展示作为生产关系总体的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的目标。也就是在全面阐述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在经济关系多层次延伸的范围和空间层面对经济政策与策略等具体经济活动做出解读与论证,进一步揭示这些层面的经济范畴与规律体系,实现基本原理叙述与现象性规律、范畴描述的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说,基本原理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与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可以采用不同的理论体系叙述方法。前者必须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后者则可以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因为,基本原理的创立必须从社会经济制度最简单、最一般的范畴,也就是元素或细胞形式开始,运用辩证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展开内容,直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和规律体系,才能在完成基本原理创立的基础上做一些基本的叙述。这一过程一旦完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各种矛盾已经充分展开,范畴已经发展为总体范畴,对具体经济政策、方略的解读与论证不再需要抽象掉什么要素,只需要运用此前已经创立的基本原理、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对现实经济政策、方略等做一些基本的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就能完成使命。叙述方法的这种差异意味着基本原理的叙述部分与对现象性规律与范畴的叙

述部分可以在一个总的体系下分别进行叙述。

政治经济学从基本原理到运用基本原理解读、论证具体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这种层次性表明,构筑不同层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遵循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尽管它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经济制度,需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但它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读和论证现行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是它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体系构筑需要严格地运用辩证逻辑方法进行叙述,但在基本原理尚未创立之前,承担这类任务的“教科书”,可以既不按照《资本论》及其续篇的逻辑结构去逐渐展开理论,也不宜简单套用《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处理理论要素,较为实用的方法就是按照形式逻辑顺序依次解读、分析、论证这些具体政策、策略、方略被采用的原因,以及它们的基本内涵、功能、作用、意义、实施方式、影响、调整等。这些以分析、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够不上基本原理的级别,但只要从基本国情出发,紧紧抓住发展是第一要务,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策略、方略的研究作为己任,并且能够根据现实经济政策的演变适时做出调整、创新,就可以成为很实用的政治经济学。在短期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这个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以便为现实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但是,在长期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确保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正确性与连续性,有效地实现社会重大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政策层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基本原理层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供可靠的、应当遵循的经济规律叙述,才能够为具体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经济政策、策略、方略也不能建立在“空地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灵活地运用其方法安排结构、阐述内容、处理理论要素的许多先例。在《资本论》体系创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总结概括出一系列范

畴、经济规律,以及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支撑马克思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进行理论叙述,但为了使这些成果能够在工人运动中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把这些理论成果作为普及性常识以通俗的方式介绍给工人阶级,例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就是其中一例。以这种方式处理理论并非为了理论本身的论证与推导,而是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行动策略与方略、战略举措等具体经济政策。《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逻辑方法谋篇布局、严密论证的理论体系,它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基本原理,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行动纲领、行动策略、战略举措等具体政策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故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政策、策略性答案。本来,社会主义也应该建立类似于《资本论》那样严整的经济学体系,只是一直以来,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较短,经济关系发展不充分,不具备构筑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工作不够深入,尚未抽象概括出构筑理论体系所需要的范畴体系,不具备运用辩证逻辑方法进行理论叙述的基本条件。

无论当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但这些成果基本上属于现实经济政策及其解读与论证。把现实经济政策直接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可以说早已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的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就是这样做的。苏联学者波里林在1937年《经济问题》第1期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及其讲授》一文,其中写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刻也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国家所奉行的政策。苏联全部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政策的作用的基础上。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政策是不可设想的。”<sup>[5]</sup>多年来,中国学者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基本上采用了苏联学者的做法,其内容基本上是现实经济政策及其解读与论证。可能是因为习惯上的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人们很自然地与现实经济政策、方略相联系,甚至直接将其视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仅学术界是如此,官方也这样看待。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sup>[6]</sup>(P83)。学者们也认为,这个“初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事实上,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政策、策略、方略层面上的经济范畴与规律的汇总,属于很典型的以解读和论证现实经济政策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采用什么样的具体政策、策略、方略、运作方式,是党和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任务,但对其进行理论层面的解读、分析、论证、归纳,则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 八、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分需要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做出解释和论证,但更需要构筑一个基本原理体系,以便为这种解释和论证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基本原理是指某一领域、部门或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它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抽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而得出的,故其正确性能被实践检验与确定,且从这样的原理出发,可以推演出各种具体的定理、命题等,从而对进一步实践起指导作用。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等是否科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们属于尚未升华为基本原理的具体行为举措。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是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阐述基本原理体系的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它既包括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阶层经济生活条件的基本原理,还包括专门研究国家层面、国际经济关系层面、世界市场层面的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外在表现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需要抽象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基本原理支持,还需要具体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解读与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方面的服务,要想有效地满足这样的要求,运用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是基本途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汤在新.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J]. 当代经济研究,2005(1).
- [5] 波里林. 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及其讲授[J]. 经济问题,1937(1).
- [6] 邓小平文选[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ystem Methodolog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Mingyuan

**Abstract:** “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is inevitably a general structure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that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socialist economic relations , it includes fundamentals specialize in economic conditions of China ’s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basic class ,and theories specialize in economic relations of internal relations ,external performance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on national leve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evel and world market level.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s not only abstract leve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o provide support with fundamentals ,but also specific leve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o interpret and demonstrate reality economic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general plans. In order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using Marx ’s “ Six Copies Structure ” plan ,*Das Kapital* methodology to build the theory system of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should be the basic way.

**Key Words:** “ Six Copies Structure ” plan ;*Das Kapital* ;dialectical logic approach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ystem